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5013

“京派”文学交游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

蒋士美^{1,2}

(1.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理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 1930年代, 沈从文借由“京海之争”确立了其后期“京派”领袖地位, 并充分利用这一社会身份广泛开展文学沙龙、聚餐宴请、酬唱应和等各类文学交游活动, 建构了旨在沟通代际、培育新人的文坛关系网。沈从文开展的这种以文学青年为对象, 以传播经典观念、美学追求为目的, 进而实现“重造”经典、重塑“新文学”之目标的文学交游活动, 显示出极其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 对于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意义重大。

关键词: 沈从文; 京派; 文学交游; 自我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5-0107-07

Literary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Beijing School” and “Self-Classicization” of Shen Congwen

JIANG Shimei^{1,2}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Shen Congwen established his leadership role within the “Beijing School” during the “Beijing-Shanghai Debate” and fully leveraged this social identity to extensively engage in various literary interactions, such as literary salons, dinner gatherings, and poetic exchanges. These activities helped him build a literary network aimed at bridging generational gaps and nurturing new talents. Focused on engaging young literary enthusiasts, Shen Congwen’s literary exchanges were intended to disseminate classical concepts and aesthetic pursuits, ultimately striving to “reconstruct” the literary canon and reshape “New Literature”. These efforts reflected a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self-classicizatio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olidifying his own status as a literary classic.

Keywords: Shen Congwen; Beijing School; literary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self-classicization

收稿日期: 2025-04-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研究”(23YJC751008);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24B0604)

作者简介: 蒋士美, 男, 湖北宜昌人,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湖南理工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地理学。

沈从文一生起落沉浮、曲折离奇,充满了浪漫和传奇色彩。在这样一段风云变幻的生命历程中,1930年代无疑是一生中最为志得意满的一个时期。彼时,其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均步入了理想的阶段。首先,经由胡适、徐志摩等前辈的提携、扶持,沈从文先后进入吴淞中国公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青岛大学等高校担任教职,经济基础日渐牢固,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其次,其文学创作日趋成熟,《边城》《湘行散记》之类风格独具的佳作喷涌而出,逐渐步入中国现代文坛的核心圈层。1933年9月,他正式入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此为阵地发起了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京海之争”,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后期“京派”领袖的角色地位。

“京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其既没有固定的组织纲领和成员结构,也没有确切的成立时间和文学主张。可以说,“京派”并非纯粹的地域性作家群体组织,而是一群有着相似美学追求和文学理想的作家,通过各种方式聚到一起相互唱和交游的组织。其边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这也使得其历史面相愈发特殊而又复杂。一方面,文人相互之间交往频繁、过从甚密,使得“京派”有着极为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京派”一直没能形成固定的群体结构,其内部成员的流动与迁移复杂多变。不管“京派”之源流与结构如何,可以确证的一点是,它是中国现代文坛一个客观存在且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作家组织;并且,自从“京海之争”爆发开始,沈从文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京派”核心及代言人,一如萧乾所言,“我始终认为一九三三年为京派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也即巴金、郑振铎、靳以北来之前),京派是以周作人为盟主”^[1]。在那之后,沈从文与林徽因成了“京派”的灵魂人物。以序跋书文互为唱和、以沙龙聚谈互为交游,是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京派”文学圈最主要的交往方式。从文学史和作家的角度而言,这些文学交游活动,最终都深刻地介入并参与沈从文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之中。

一、唱和:“京派”文学圈自我表达

进入1930年代之后,沈从文声名渐起,并在

1933年9月正式入主《大公报·文艺副刊》。其实在此前后,他便已开始与刘西渭、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李连萃、刘祖春等居于北方文坛的青年作家密切交往。他们以私下的书信往来和文章唱和为途径,沟通交流,切磋呼应,形成了相近的文艺理念,共同追求着超越功利的美学理想。到了1930年代中期,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逐步演进,并形成了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京派”文学圈。其圈内成员性情相投、惺惺相惜,“京派”文学圈的形象由此逐步确立。

早在“新月”时期,何其芳便与沈从文有过书信往来,只是未曾谋面。1929年求学于吴淞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班时,何其芳曾经尝试写作小说,但因缺乏经验而难以下笔。苦恼异常之际,他碰巧得知当时已在文坛小有名气的沈从文正在本校任教,于是便试着写了一封求教信,向其请教创作技巧。沈从文很快就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写作并无诀窍与门径,唯有多读、多写、多体验、多观察。受其指导与鼓励,何其芳此后不久便完成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摸秋》,并以“禾止”为笔名刊登在《新月》第3期第1号上,由此正式进入现代文坛。尽管后来何其芳转到了北大求学,但一直同沈从文保持密切交往,并常常得到沈从文的提携与扶持。沈从文入主《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更是发表了许多何其芳的作品。可见,“京派”时期,二人已是知交好友。1935年2月12日,沈从文还以“上官碧”为笔名特意写作了一首名为“何其芳浮雕”的诗,赞美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全诗如下:

夕阳燃烧了半个天,
天上有金云、红云、同紫云。
“谁涂抹这一片华丽的颜色?
谁有这个胆量,这种气魄?”
且低下头慢慢的想,慢慢的行,
让夕阳将心子也镀上一层金。

不希罕财富,幸运,和不可朽,
也不胡乱想成王成仙,
只有个小小嗜好——并不贪!
记取一句诗,便来低头吟哦,
不用贫俭文字写成,
这诗句,一个陌生女子的眼波。

眼波里写得清清楚楚：

“狂热，把灵魂从地狱带进天堂，
亲昵晕乱与迷惑。”
幽谷中的百合——鲜洁芬芳，
新酿的酒——使回忆成为温暖的力量。

温习那一句荒唐的诗，
面对湛然的碧流。
黄昏黯淡了树林小山，
悄悄的引来一片轻愁。
微明中惊起水鸟一双，
有谁问：“是鸂鶒，鸳鸯？”
“不用说，我知道，
春水已经浸到堤岸丛莽了。”^[2]

仔细品读整首诗歌，可以深刻感受到沈从文对何其芳的“浮雕”式刻画细微而精准，特别是对何其芳诗歌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华彩的意象铺排，描绘得极为妥帖。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何其芳其人其作的理解相当深刻。

在沈从文引领后期“京派”期间，与其过从最为紧密的“京派”后学，自是萧乾。就像当年徐志摩提携自己那般，在萧乾的文学之路上，沈从文也给予其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将萧乾领上文学道路，悉心教导他应该怎么写小说，还不辞辛劳地为他修改作品。萧乾后来在《认真：一个妥实的出路》一文中回忆沈从文对自己的帮助时说道：

“我日夜咬住牙，想拼着写一篇用不着他动笔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还只是在努力着。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3]可见，沈从文对语言文字的运用、意境的营造的精益求精深刻地影响了萧乾。1933年，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经过沈从文的指导、推荐，刊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第十二期。这次发表经历，大大激发了萧乾的创作灵感与热情，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下《花子与老黄》《小蒋》等6部作品，全部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不仅是萧乾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也是他的机遇创造者。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发表之后，颇得“京派”重镇林徽因的赏识。沈从文借此机会主动将他引荐给林徽因，带他走进了赫赫有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自然是莫大的鼓舞：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4]³⁴⁰在这个汇聚着各类文化精英的客厅里，萧乾先后结识了朱光潜、巴金、何其芳、卞之琳等一大批北方文坛名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步成长为“京派”文学圈的后起之秀。后来，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出版，沈从文还特地为其撰写了题记，称赞萧乾说：“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这意见我相信将与所有本书读者相同的。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5]³²⁵同时，他对萧乾表达了自己的寄望：“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5]³²⁵⁻³²⁶诸如此类的寄语，如今读来，仍旧不失为诚恳的写作指点。1935年下半年，沈从文亲手将萧乾推上了《大公报·文艺》的主编之位，足见他对萧乾是何等的信任与激赏。

萧乾、何其芳之外，沈从文还同诸多“京派”周边的青年作家有着文章唱和，如卞之琳、李寒谷、王林、王西彦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林。王林原名王弢，又叫王相林，笔名隼闻，当时是国立青岛大学外语系的一名学生。虽然他所学的专业是外语，但他酷爱写作。其作品主要描写的是“谷贱伤农、丰收成灾”之类的内容，反映的是底层农民在期待与盼望之中突然陷入绝望境地的无奈、苦楚。这样的主题和内容，在那个年代自有其独特价值。《这年头》是王林初涉文坛的试笔之作，虽然艺术性、思想性都略显稚嫩，但沈从文看重其揭露意义，给予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头条发表的机会。此后不久，王林写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幽僻的陈庄》。该书于1935年在北平出版，沈从文特意为其写作题记，向读者倾力推荐：“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而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朴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是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5]³³¹⁻³³²“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5]³³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幽僻的陈庄》完稿之际，王林曾满怀期待地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两度寄给鲁迅,寄望得到这位文坛巨擘的指点。这在鲁迅日记中有着明确记载:“得雋闻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6]509}“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6]528}但不知是何原因,鲁迅并未对王林的小说给予任何的点评和回应。相比鲁迅的视若无睹、不予置评,沈从文对王林这类青年无名作家的态度,明显要柔和、热情许多。

“京派”文学圈声誉的形成与鹊起,既来自从观念到创作再到为人的一体化实践,也离不开圈内文人之间的互动与彰显。沈从文通过书信向年轻作家传授写作经验,通过序跋、书评及文章提携、推荐文学新秀,自然也会有众多“京派”同人投桃报李,与其文章唱和,比如李同愈所撰《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刘西渭所撰《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影心所撰《评〈八骏图〉》、毕树棠所撰《从文自传》、若愚所撰《废邮存底》等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西渭对《边城》的评价。作为沈从文的知己好友,刘西渭应《文学季刊》之邀约,写作《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一文,并通过此文将对“沈从文”的解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文章开篇花费大量笔墨论证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性,指出批评家的点评必须慎之又慎。接着,他引出了自己对沈从文其人其作的判断:“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艺术家。”^{[7]42}“《边城》便是这样一部 idyllic 杰作。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艺术的。”^{[7]45}强调沈从文的小说细致而不琐碎,真实而不教训,风韵而不弄姿,美丽而不做作,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7]45}。刘西渭的态度真诚而热烈,其以散文笔法呈现出了沈从文小说物我统一、人文统一的境界。在这样的结构中,沈从文的人格形态、文学理想和文章形态呈现出内涵一致的象征性,“沈从文”的整体形象被凸显出来。正是在“京派”文学圈相互的唱和、阐释与推崇之中,沈从文作为其中的核心,呈现出边界清晰,有着自己信仰体系、文学理想的人格形象。

二、交游:文坛关系网的构建与文学理念的推广延续

文人群体之间的交往,往往折射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态度。与传统的宗族和耕读式

的乡村群体交往不同,现代文人群体中彼此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定,是以学缘和业缘为纽带,以共同构建的空间网络为依托而进行的交往。程光炜在《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文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出现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也就是说,都市文化如出版、报馆、现代建筑、公园、咖啡馆等,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生^[8]。许纪霖同样认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都市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同人刊物、出版社和广场等。1930年代,以沈从文为领袖的“京派”后期文人群体,正是凭借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来今雨轩”茶会、丰泽园聚餐会、“太太的客厅”以及“读诗会”等公共空间网络的构筑和交往,在复杂动荡的时局下,以“远离政治”的政治态度,追求着独立自由的文学精神和文人品格,展现出“京派”文人群体所抱持的自由主义文化心态,推广并延续了现代文学作家精英化的纯文学立场。

1930年代的北平,一批新的文学作家,以《文学杂志》《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刊物为中心,借由文学创作交流为沟通枢纽,建构了一种极度类似于哈贝马斯在论述18世纪欧洲境况时所提炼的那种文化公共空间,即“以北京文人为主体的文学性公共空间交往网络”^[9]。其中,《大公报·文艺副刊》扮演着一种媒介的身份——“从媒体的物质层面看,现代传媒往往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形态和变异,诸如作家队伍、文学运动、文体形式等”^{[10]3},而报刊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知识分子相互联结,在报刊的旗帜下共同完成他们的理想,逐渐就形成了以报刊传媒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10]7}。显然,《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汇合北京文人构筑后期“京派”作家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建构了一个类似线上的虚拟性的交互领域,亦即《副刊》这一传媒空间;其二,借由刊物开展约稿、聚餐、沙龙等文化活动,建构出以“丰泽园”“来今雨轩”为中心的线下交流场域。

事实上,早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出刊之前,杨振声和沈从文作为刊物的主编,就已经通过品茶、宴请等方式同许多北方文人建立了联

系，只不过当时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创刊及约稿等方面的事宜。在杨、沈二人的全面筹备之下，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正式发刊，编委会成员还包括朱自清、林徽因、周作人等文坛大腕。不过，刊物的主要编辑事务基本上由沈从文一人承担。关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家群体，前文已经作过考证。其虽然也包括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梁实秋、林徽因等北方成名作家，但主体还是依托刊物逐步成长的青年作家，比如卞之琳、李健吾、李长之、林庚、陈梦家、芦焚等。这一批文学新秀在主编沈从文的大力指导与关怀之下，飞速生长，大多成为后期“京派”作家的中坚力量。这些青年作家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起并托起后期“京派”，离不开沈从文的付出与经营。他不但在自己家里热情招待造访的文学青年，同时还频频以副刊举办创作交流会的方式，邀请他们到“来今雨轩”品茗、用餐、对谈，这种活动堪称文人雅集。

对于1930年代的北京文人来说，位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是一处众所周知的文化圣地。“来今雨轩”这一地名来源于杜甫诗文“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寓意故交新知、新老朋友，欢聚一堂。现代作家许钦文曾撰文对该地境况作详细勾勒：“这公园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园内古柏参天，无论游玩和约会亲友，都很适宜。”^[11]对后期“京派”文人群体而言，沈从文自然是这个进行聚合沟通的开放场域的核心。他以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约稿、组稿为名义，将“京派”文人（尤其是年轻作家）聚集起来，聚会之目的“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4]340}。

亲身参与过聚谈会的王西彦曾回忆说，“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12]103}，并详细记述了当时在此的聚会场景。他谈到，这样的聚会大概每一两个月一次，每次都是沈从文发通知信邀约，每次邀约的作者也不尽相同。由于聚会是沈从文以刊物的名义组织起来的，照理说他应该是绝对的灵魂人物，但实际情况却是，聚会似乎并无主持者，参与其中的文人作家皆能畅所欲言。交流的主要内容围绕文学创作展开，偶尔也会谈到社会现状与人生体悟等等。交流的时间并不固定，时长时短，基本上维持在两到三小时之间。会议期间，沈从

文主要就一些作者的稿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王西彦心目中，沈从文就是一位亲和力十足的创作导师：“他只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大朋友，他也从不摆出一副导师或主编的架式。”^{[12]104}这种着意于交流感情、放松心情、分享创作经验的聚会，全然就是一种自由式漫谈，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平等沟通，也是文学理想与创作思想的激烈碰撞。经验丰富的成名作家通过谈话表达自身的创作理念，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则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熏陶，一个群体之间的认同感即由此悄然发生。对于沈从文在聚会中所传递的文学理念，王西彦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其一，坚持的文学态度；其二，为艺术的文学功用观；其三，强化对语言文字的驾驭、使用，不断磨炼文学技巧。由此可见，沈从文对待文学是异常严肃、认真且纯粹的，而这样的文学态度又通过漫谈式的交流，深深影响了萧乾、何其芳、卞之琳、王西彦等青年作家。与此同时，这样的聚会，也有力地扩充了青年作家的文学交游范围与人脉资源，拓宽了他们的文坛朋友圈。

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谈会分为聚餐会和茶会，两者在功能上有着明显不同。简而言之，聚餐会的重心在于宴请知名作家，茶会则着重培植文学新秀。不过，这种差异化是在萧乾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之后才出现的。虽然萧乾自称延续了沈从文定期在来今雨轩聚谈的传统，但据其时尚属青年作者的芦焚回忆，在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期间，经常是分两批邀请作者来参加聚会的：“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组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总之，除了冯至同志三十来岁，第二批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13]与芦焚同期的青年作家严文井、王西彦等人的回忆文章亦可对其加以佐证。他们三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加入《大公报》聚会之中的，而且回忆中列举的名单也相差无几。除开他们，参加聚会的大体上还包括杨刚、田涛、李威深、刘祖春、屈曲夫等人，均为年轻的文坛新秀。由此可推断，《大公报·文艺》在来今雨轩举办的聚谈会，一方面是为了凝聚知名作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培养青年作家。这表明，此类“刊物与聚会互为依凭”的文学交互场域，既是“京派”文人群体的联谊会，

也是前、后期“京派”进行代际交往的桥梁。

可见,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谈会同时兼顾了新老作家,只不过学界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京派”知名作家身上,而对新人注目不多,但如果仔细考察“京派”作家群体的发展流变,则可发现,后学新人才是“京派”文学得以推广、延续并不断发展的核心与主流。其时,沈从文作为北方文坛领袖,充分利用刊物和聚会这一互为表里的公共空间,提携青年,培养新秀,传达自身的文学主张、审美理想和经典追求;参与“来今雨轩”聚谈会的青年作家,则对沈从文的为人及文风深为服膺,他们对沈从文创作沉寂半个世纪之后的重新估价并最终进入文学经典之列,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追忆:情感关系与文学态度的代际传承

唱和与交游广泛出现于“京派”的发展进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参与“京派”文学史的建构之中^[14]。从这一层面而言,其主要得益于当年后期“京派”之中的青年作家、文学新秀对前辈作家的回忆与书写。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估沈从文热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沈从文的作品价值在这一时期被重新认识,其文学史地位在这一时期得以重新确立,并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行列。这一方面得益于海外汉学家对他的关注与重视。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文学性”为核心,对沈从文的作品价值加以重估,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15],肯定了他文坛大家的地位。1979年,该书分别在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并在大陆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与关注。与此同时,金介甫、傅汉思等众多海外学者对沈从文的介绍、阐释与研究,也进一步扩大了沈从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沈从文作品价值的重估得益于“京派”同人对其“京派”时期文学活动的追忆与推崇。

1930年代,作为后期“京派”文学代言人的沈从文,以其对待文学的严肃、虔诚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到1980年代时,许多当年曾经受到沈从文培植、提携的青年作家

回首往事,无不感念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文学品格,对其作品大加推崇,这客观上极大地推进了沈从文文学的经典化。萧乾、汪曾祺等一大批后来蜚声文坛的“京派”名家,他们的解读和评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其对于挖掘沈从文创作中的经典因子意义重大。比如,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文中便不吝溢美之词,以《边城》为例,从人物塑造、风景画笔法、语言、结构等方面,全面地解读并呈现出了沈从文作品中所蕴含的蓬勃持久的艺术生命,该文在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对于沈从文的回顾与重估,大多来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沈从文关怀指导的青年学生和文学新秀。198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就收入了大量沈从文学生以及“京派”后学如卞之琳、邵燕祥、李霖灿、程应镠、王西彦、严文井等所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些人虽然并不隶属于“京派”,但与沈从文关系亲近,完全可以视作他的学生,亦可当作“京派”同人来看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西彦。作为一名左翼作家,他在自己青年时期便与沈从文过从甚密、交情匪浅,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创作理念、审美追求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他认为,沈从文不会有意同左翼阵营相对抗,其文学观点与左翼阵营存在一些分歧,纯粹是因为其对党派政治无兴趣、不敏感。王西彦撰写的《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一文,饱含无比诚挚的情感,令人读后为之动容;其对二人交往细节的一些叙述,亦足见沈从文高山仰止的人品文风。

一个作家的“自我经典化”,如果缺少文坛的回应,没有当代及后世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认可与接受,其作品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几无可能。正如艾略特在其文学批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所言:“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16]文学经典体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体系,而作家的“自我经典化”恰恰寄寓着对这一文学经典体系进行修改的意图,但这一意

图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他者批评的力量。只有经过了批评家的指认、检验和时间的大浪淘沙，作家才能真正进入到经典文学史的脉络之中，并占据一席之地。从这一层面来讲，作家主动地与读者及批评家建立连接极有必要，而文学交游，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一种双向连接方式。对此，沈从文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充分利用自己后期“京派”领袖的社会身份，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各类文学交游活动，尤其重视与青年作家（特别是“京派”后学）之间的师承授受、唱和交游。他定期与“京派”同人开展文学沙龙、聚餐宴请等活动，建构了一种健康的代际沟通与培育新人的文坛关系网。这种以文学青年为对象，以传播自己的经典观念、美学追求进而实现“重造”经典、重塑“新文学”为目标的文学交游，对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意义重大：一方面，沈从文借此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批理想的“经典发现人”。自1940年底被定义为反动作家之后，沈从文在文坛沉寂了3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代初期，方才重见天日，其作品的经典价值随后被发现、认可并广泛传播。可以说，其文学史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离不开这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对他的追忆与解读。另一方面，沈从文也借此寄托了自己“重造经典”并重塑“新文学”的文学理想。他之所以将青年作家作为自己文学交游的主要对象，正是因为他对年轻人寄予厚望，认为只有青年作家保持思想的活跃与精神的独立，经典重造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17]。

总体而言，沈从文通过文学交游进行“自我经典化”，一定程度上为作家群体（尤其是青年作家）提供了一个创作主体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鲜活标本：在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中，作家本身并非无可作为，基于对文学史深刻理解之上的自我呈现与塑造，进而通过文学交游等媒介手段来传播、彰显自身创作的显赫实绩与独特价值，不但能有效地影响同时代读者和批评家的价值评判，也可以为后来者进一步挖掘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指明方

向。可以说，经由文学交游的展开，沈从文向内隐秘地向他者呈现了自身作品的经典价值，向外则寻找并确立了自身作品经典价值的发现人。二者共同发力，最终促成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参考文献：

- [1] 萧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致严家炎)[M]//萧乾.萧乾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634.
- [2] 沈从文.何其芳浮雕[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04-205.
- [3] 萧乾.认真：一个妥实的出路[M]//萧乾.萧乾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44.
- [4]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M]//萧乾.萧乾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5]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6] 鲁迅.日记二十四[M]//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M]//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8] 程光炜.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 [9]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34.
- [10] 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1] 钦文.来今雨轩[J].新文学史料，1979(3)：76.
- [12] 巴金，黄永玉，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 [13] 师陀.两次去北平（续篇）[J].新文学史料，1988(3)：71.
- [14] 陶梦真.京派师承的多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9)：103.
- [1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15.
- [16] 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3.
- [17] 蒋士美.助益青年入文坛：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9(1)：94.

责任编辑：黄声波